



一纸过年书，千年中国情

——读《过年书》有感

聂桐/文

冯骥才先生的《过年书》，是蘸着人间烟火、写满文化深情的温暖馈赠。马年红灯笼次第点亮时，翻开这本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著作，仿佛瞬间踏入一条跨越时空的年味长廊。

它不同于通俗读物的浅白介绍，也不刻板的民俗考据。它以“守护者”的深情、“亲历者”的体验和“思考者”的清醒，构建出一个立体鲜活的春节世界。从童年记忆落笔，经习俗演变铺陈，以遗产保护收束，最终展望未来。这本书带领我们层层拆解春节的文化内核，让我们在红纸与烟火间，读懂独属于中国人的温暖与力量。

开篇，冯骥才先生以亲身经历勾勒出童年年味的生动画卷。他用细腻笔触还原不同时代、地域的过年场景：北方胡同里的鞭炮余响、南方集市上的年画叫卖、祖辈传下的祭灶贴联、孩童手中的灯笼……这些不是孤立的民俗碎片，而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集体记忆。

春节从来不是某一地的专属，而是跨越南北、穿越时空的情感纽带。无论是旧时庙会烟火，还是如今云端团圆，那抹红色年味

始终流淌在生活细节中——春联的墨红、年画的丹红，更是中国人团圆相守的精神底色。这种以个人记忆为引的书写，让春节从“文化概念”回归“生活现场”，亲切鲜活，让每位读者都能在字里行间，看见自己童年的年光。

若说开篇是唤醒记忆，书中核心便是对春节习俗的深度解剖。冯骥才先生不满足于罗列“贴春联、吃年夜饭”的习俗清单，而是以文化学者的眼光，梳理春节符号的演变脉络：从门神的古今更迭，到年画的色彩寓意；从灯笼的形制变迁，到庙会的文化内涵；从北方的饺子、南方的年糕，到各地的舞龙祈福……

在他笔下，每个习俗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仪式，而是凝结古人生活智慧与情感寄托的文明印记。这些文字跳出“知识科普”框架，将习俗与生活、传统与当下紧密相连，让我们懂得：守护春节习俗，本质是守护中国人的精神原乡，守护跨越千年的文化根脉。

这本书最具分量的部分，是冯骥才先生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先行者的深刻思考。面对现代化浪潮冲击，《过年书》不回避现实困

境：一些传统技艺面临断代，一些古老仪式逐渐简化，一些年味元素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被淡忘。

但冯骥才先生未陷入怀旧感伤，而是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告诉我们，保护春节不是墨守成规的复古，而是在坚守其精神内核的基础上，让传统与当代生活相融共生。书中从非遗保护视角，系统阐述春节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价值，呼吁人们在拥抱现代生活时，不忘保存传统的温度与深度。这份兼具人文情怀与学术视野的论述，使《过年书》超越一般文化读物，成为一份写给时代的文化宣言——守护春节，就是守护中国人的精神家园，守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。

作为文化传播读本，《过年书》还承担向世界讲述中国春节故事的使命。冯骥才先生以开阔的视野，梳理春节在时代与地域中的多样风貌，使其从中国本土节日升华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化财富。

书中文字既有对本土年味的深情回望，也有对文化传播的理性思考，向世界传递：春节不仅是家庭的团圆时刻，更是中国文化生命力的生动体现。它用通俗有力的叙述，将丰富民俗文化转化为大众可感可触的内容。无论是想了解春节传统习俗的青少年，还是希望重拾年味记忆的成年人，抑或是关注文化遗产的研究者，都能在书中找到共鸣与启迪。

《过年书》不是普通节日读物，它是冯骥才先生写给中国人的年味家书，也是向世界展示春节文化的深情名片。马年新春来临之际

际，它提醒我们：春节的魅力，在于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，在于人间烟火的温暖相守，在于代代相传的文明坚守。愿我们都能在这本书的陪伴下，重拾年味本真，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中，迎接有温度、有底蕴、有力量的新春，让中国春节的温暖与美好，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、光华永续。



年画里的摩登中国年

——读《四时吉祥·春节》

王玉美/文

当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古朴线条，邂逅当代生活的鲜活烟火，一场关于春节的美学与文化对话，便在《四时吉祥·春节》中缓缓开启。

这本由吴敬著绘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画书，以独特的艺术表达，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既扎根传统又呼应时代的新春画卷，让年味在古今交融中焕发新活力。

春节是中国人血脉里的节日仪式。从腊八粥香袅袅，到元宵灯火阑珊，一个多月的年俗流转，藏着一代代人的生活智慧与情感记忆。《四时吉祥·春节》不满足于简单罗列年俗，而是以时间为轴，将喝腊八粥、赶春运、打年糕、贴年红、包饺子、吃汤圆等习俗，连成一幅流动的节庆图景。

尤为巧妙的是，十二生肖在书中悉数登场。它们不再是静止的符号，而是化身春节亲历者：有的随大人采买年货，有的围坐桌边共享团圆饭，有的在元宵夜与孩童嬉戏。这样的处理，让生肖文化融入当代家庭生活，不同年龄的读者都能在书中找到春节共鸣。

绘本的艺术表达是其动人之处。作者吴敬深植传统，借鉴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墨线套印工艺，用简练朴拙的线条勾勒出人物与场景，既保留传统年画构图饱满、主次分明的特色，又以大胆撞色突破常规视觉认知。书中未采用传统年画常见的红绿搭配，而是以丹红、槐黄、葵紫、铜绿为主调，浓郁暖色烘托节日喜庆热烈，紫色点缀又添几分沉稳雅致，让传统年味与现代审美悄然融合。

这一色彩创新，延续了朱仙镇年画“黄紫撞色”的独特韵味，让画面跳出刻板传统框架，展现出摩登生动的视觉质感，恰如书中所描绘的“古老又时尚的中国”，让传统艺术在当代语境中焕发生机。

在文化内涵承载上，绘本也充满巧思。作者从典籍与民间传说中汲取养分，使每幅画面都成为可品读的文化密码。灶王爷被麦芽糖黏住嘴巴，只向玉帝言好事，源自百姓对平安吉祥的祈愿；山魈惧怕爆竹的传说，化为画中驱邪纳福的场景；元宵夜偷青的熊猫，将民俗趣味与可爱形象巧妙结合，让传统文化不再是疏离的符号，而是带着温度、可亲可感的生活故事。这些细节并非随意点缀，而是对年俗文化的温柔回溯，让读者翻阅时，不仅看到春节的热闹形式，更读懂习俗背后的情感与寓意，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浸润。

更可贵的是，绘本自然衔接起传统与现代，勾勒出当下中国人过春节的真实模样。画面中，既有汉服少女、传统戏台、手作糖人，也有踩滑板的少年、衣着时尚的奶奶、正在擦窗的“蜘蛛侠”，甚至出现唐僧师徒齐聚过年的诙谐场景；春运路上，摩托车队与返乡列车满载团圆期盼，与赶年集、办年货的传统情景交织。这种古今交融，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隔膜，让孩子们看到当下春节的生动面貌，让成年读者在画面中找回童年记忆，使年味在时代流转中始终鲜活。

《四时吉祥·春节》不仅是一本图画书，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。它以朱仙镇年画为骨，以现代生活为肌，以生肖文化为魂，将春节的习俗、故事、美学与情感，编织成一册可看、可读、可品的节日绘本。它让孩子们在斑斓图画中触摸年俗温度，让成年人在细节探寻中重拾对节日的敬畏与眷恋，也让中国年文化以摩登亲切的姿态，走进人们的视野。

在年味渐淡的今天，这本绘本如一盏温暖的灯，照亮民俗传承的可能路径。它提醒我们，传统文化从未远离，只要以创造眼光解读、以真挚方式呈现，古老年俗就能在当代生活中继续生长，让春节的仪式感与幸福感，在一代代人心中新火相传。这或许正是《四时吉祥·春节》最珍贵的价值——以画笔为媒，以故事为桥，让年画新韵绘就出属于我们时代的、鲜活的、摩登的中国年。

抵达与出发之间

——读《两种故乡》有感

彭忠富/文

广西诗人刘春的诗集《两种故乡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），如一座沉默而坚固的石桥，静静横亘在“身体的故乡”与“心灵的故乡”之间。它邀请读者从此岸走向彼岸，或伫立桥心，感受来自两端、温度不同的风。

这不是一部沉湎于田园牧歌的乡愁合集，而是一份以生命为纸、岁月为墨的“精神还乡”路线图。其最珍贵之处，在于同时呈现了归途与起点、安顿与远行，并找到了诗意的平衡。

刘春的诗语，有近乎朴素的透明感，如“山影”般沉默厚重，又如“细雨”般无声浸润。这不是简单的白描，而是淬炼后的精准。他写父亲：“那座山站在原野上/高大，沉默，创世之初就是这个样子”。名词“山”“原野”，形容词“高大”“沉默”，名词“创世之初”，几个基础词汇，构筑起一个时空凝滞、情感磅礴的意象。这种精准，源于诗人对事物本质的长久凝视。

“两种故乡”在刘春笔下，不是空洞的概念，而是浸透在每一处具体感知之中。身

体的故乡，是“万福路”的夜色、“清平乐”中的薄田与亲人、“桑树地的夜晚”里走失又复得的萤火。这些记忆碎片不止于怀旧，其间美好与困顿并存，构成一个真实、饱满，令人既眷恋又清醒的“原乡”。心灵的故乡，则是对存在本身的持续叩问。《决绝书》中“我独自合唱，单人成队”的宣言，是对个体精神独立性的默默坚守；《真理》一诗，从一朵花的凋谢领悟“世上没有一样事物是多余的”，流露出对生命价值平等性的朴素信仰。

尤其动人的是，他将两种故乡的追寻，融入对亲情的深沉书写。《看母亲干活》《回城之前》等诗篇，在贴春联、摘橘子、默默对视等日常细节里，堆积起难以言说的依恋与静默的愧疚。父亲化身为“山影”，“他在天上看着我们”。这看似简单的句子，因前面无数沉默的铺陈，而千钧之重，道尽了东方家庭情感如山般稳固、如影般相随的深沉羁绊。他的所有追问，最终都落回对生命来处与归途的确认，成为一种充满现代性困惑、底色依然温暖的“天问”。

刘春擅长构建一套质朴而自洽的意象体

系。风、山、石、铁等基础意象是其诗歌根基，被赋予鲜活的当代生命体验。风，可以是丈量大海的漫游者，也可以是吹动乡土变迁的无形之力；铁，在等待锻打中“开花”，寻找自身意义。这些意象相互关联、彼此呼应，共同支撑起其“大地诗学”的广袤空间。他的修辞极尽克制，始终服务于情感表达，如盐溶于水，不见其形，只留其味。那些比喻往往在关键处点亮全诗：铁树开花，如同“盲者突然洞悉了命运的秘密”；理想主义的风“倒下，又站起来，一生都在路上”。在《词不达意》组诗中，他以当代视角重访古典诗词意境，寻找穿越时空的情感共振，印证了“无论形式如何变换，人类最根本的情感从未改变”。这种打通古今的自觉尝试，使其诗歌意境在个人的“小”中，悄然蕴含着文化的“大”。

刘春以“朴实而温暖”的笔触，将诗歌本身锻造成一个“故乡”——一个安放记忆、承载思索、滋养心灵的词语家园。在这里，还乡不是倒退，而是确认出发的坐标；远行不是逃离，而是拓宽故乡的边界。这或许正是诗歌在纷繁喧嚣的当下，能给予我们的最珍贵的精神力量。

写出生活本来的模样

——读《要有光》有感

郑凌红/文

初识“非虚构写作”，我脑海中常浮现游侠形象，他们行走四方、记录异闻。然而，真正深入琐碎真实的生活现场，用人文的笔触把握时代脉搏，需要极大的诚意与深厚的阅历。

作家梁鸿二者兼具。十五年前，她凭借《中国在梁庄》让“看不见的中国”显形。她在后记中说：“‘我’是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。”逃离、界定、视而不见、廉价的乡愁、沾沾自喜的回归、洋洋得意的时尚、大而无当的现代……我们都是这片风景的塑造者。但很多人或许没真正听懂她心底的声音：“我想写出生活本来的模样。”

在《要有光》里，梁鸿将青少年心理问题郑重提上议程并付诸笔端。这背后，是她鲜为人知的内在“纠结”——自我否定与自我坚持间的挣扎。她曾说：“我好像天生只关注自己关注的东西，就像多年前在农村奔跑的野孩子，认准的事一定要按我的想法来……”面对亲子关系和教育困惑，她不仅查阅资料，还走向田野，用亲身实践和真诚倾听赢得读者与当事人的信任。

一位读者留言：“《要有光》救了我。”他说，读完这本书及相关报道，自己开始放松，虽不知前路，但找到了与孩子相处的方法和可能。

这种方法与可能，源于写作者打破自我与社会的成见，甚至打破“判断”本身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最大程度抵达真实。梁鸿认为，每个人内心都有完整的认知体系，既是个体“偏见”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她追求的是尽可能洗掉偏见、知识背景和情感预设，以赤诚书写、贴近。

古人云：“画山者必有主峰，为诸峰所拱向；作书者必有主笔，为余笔所拱向。”对梁鸿来说，若能通过文字贯通天地、“先立其大”，文章便有核心与主线。在《要有光》中，她借助空间转换串联故事，呈现不同孩子在相异环境中的细微变化与真实状态。

寻访“失控”青少年的旅程艰辛。梁鸿来到滨海，住进离阿叔补习班最近的地方，与当地朝夕相处。阿叔是心理咨询师，他创办的补习机构日渐式微，却凸显了他作为倾听者的价值，孩子们愿在此敞开心扉。

若不翻开这本书，很多人不会知道，正是梁鸿在阿叔补习班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倾

听，赢得了雅雅、敏敏等孩子的信任。一张书桌，这边孩子们学习，那边梁鸿打字、阅读。累了，就一起休息、聊天。有时，她还和孩子们一起接待来访家长，聆听他们的困惑与期盼。

在这个喧嚣、人人步履匆匆的世界，倾诉渴望愈发强烈。每个人都渴望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所以，非虚构写作的意义，或许在于最大限度接近真实、抵达现场，在常规生活外寻找被忽略的角落，见证写作者内心蜕变。

《要有光》采用类似全知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，这是艰难尝试，也是梁鸿写作面临的挑战。这种结构性与技巧性处理，体现了一位作家深入文字、超越自我的自觉与勇气。

爱是什么？或许是呼唤，是相互倾听，是抵达彼此内心的努力。生命属于自己，力量源于自身。我们要慢慢找到这股力量，继续前行。正如书中的吴用所说：怀着创伤前行。尽管一生难免挫折与创痛，我们仍要突围，寻找属于自己的光。

这，或许正是《要有光》给予我们最珍贵的启示。